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China's "CPC Ethnic Policy during the Long March"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麻琪方

Qifang Ma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湖南湘潭 411201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研究逐渐升温,研究的视角也不断被拓宽,研究内容涉及民族政策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在以后的研究中还可以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research on “Long March perio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thnic policy” has gradually become warming. It's perspectives has been broaden. It covers every aspect of the ethnic policy and has get fruitful results, but some deficiencies also existed. We can deepen the research from its content,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following researches.

关键词: 长征; 中国共产党; 民族政策

Keywords: The long march;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thnic policy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及其对高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启示”(项目编号:19C0784)。

DOI: 10.12346/sde.v4i2.5850

1 引言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与追击,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长途跋涉和战略大转移。两年中,红军转战14个省,远征数万里,经过了苗、瑶、侗、壮、土家、布依、纳西、彝、羌、藏、回等13个少数民族杂居和聚居地区,遇到了许多复杂、紧迫的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通过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进行具体的考察和详细的分析,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并有效地贯彻执行,得到了各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爱戴与支持,使得长征这一伟大的战略转移得以顺利地实现。对此,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

述,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研究进行回顾和整理,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该问题的研究内容、特点和方式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我们把握其研究发展趋势,为进一步丰富和深化该问题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帮助。

2 研究的主要内容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党中央确定了新时期民族工作方针和对民族工作的重视,关于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政策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只是零星的,尚未形成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直到90年代后,由于“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的抬头,使得民族政策研究成为热点,相关的文章也大

【作者简介】麻琪方(1992-),男,苗族,中国湖南湘西人,硕士,讲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量发表,关于长征时期党民族政策的相关文献也相继整理出版,进一步丰富了长征时期党民族政策的研究内容。中国知网、读秀和超星等相关学术网站的搜索数据显示,从改革开放初至今发表有关“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文献400多篇/部,其中,90年代以来发表的占了绝大部分。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积极的研究成果,各领域都有所涉及,而且有些研究成果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研究

长征时期是民族政策趋于成熟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充分考虑到各民族的具体情况,所制定的民族政策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内容十分广泛。学者们也将目光集中在了对主要内容的探讨上:

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研究。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众多学者在文章中一致认为,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处理民族问题的关键,如果不能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民族问题就无法得到圆满的解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一贯遵循马列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因此,“在红军长征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十分关心少数民族的命运,非常重视民族工作,将各民族平等和团结作为制定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1]”长征开始不久,“红军总政治部就发布原则指示,要求全军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做民族工作。^[2]”在长征过程中,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和虚假宣传,使得原本就对汉族存在隔阂和警惕的少数民族对红军有误解甚至敌视,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作为民族工作的着重点。^[3]”并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决议和布告等,在这些文献中都强调“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根本政策。^[4]”如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就明确提出:“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5]”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自由的研究。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凝结着少数民族各自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文化,反映了各自的生活方式;而宗教信仰,则是少数民族一种群众性的特殊形式的心理需求和精神寄托。因此,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允许宗教信仰自由,有利于消除少数民族对红军的猜忌和敌视心理,赢得他们的信赖和支持。红军长征能够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这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严格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6]”学者们指出:“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具有广泛深远的群众性、民族性和传统性,同时又具有很强的敏感性。言行不当,可能会刺激甚至伤害民族感情、影响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落实。^[7]”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宗教信仰与民

族的传统、习惯融合在一起,成为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对待他们宗教信仰的态度往往被视为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8]”因此,在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作为一条纪律,在通过各少数民族地区时反复予以强调,并颁布相关指示。1935年6月19日,在遵义会议期间作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要求部队全体官兵要做到:“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9]”1936年,红军在对回族宣传中则更明确地宣布:“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政策,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10]”。

坚持民族自决和区域自治政策的研究。为使各少数民族真正的翻身解放,享有当家做主,各自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在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自决和区域自治的政策。1936年5月25日,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的《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明确的提出民族自决和自治的主张,这是“我们党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方面,在正规的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原则;第一次提出了各民族应‘独立自主’地处理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及其他一切事情的主张;第一次提出了党的各民族应建立本民族武装的主张。^[11]”并且付诸实践,如“红军西征时在同心和海原东部回族聚居地区创建了回族历史上第一个县级民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及其所辖区、乡的自治政府。^[12]”1935年5月22日,“中央红军在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的冕宁县,成立了冕宁县苏维埃人民革命委员会,这是彝、汉民族第一次合作创建的联合政权。^[13]”而实际上在长征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民族自决对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1934年11月29日,由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及对瑶苗民族的口号》中就强调:“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解放弱小民族的。^[14]”

关于培养民族干部、重视统战工作的研究。少数民族干部了解本民族情况,精通本民族语言,他们在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动员群众等方面,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民族干部又是民族地区革命和建设的主要力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对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及壮大红军力量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党和红军一方面积极吸纳少数民族青年加入红军,同时也尽一切可能的形式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培养自己的干部。^[15]”

1935年6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在指示中明确提出:“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并特别注意与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16]”同年8月,在毛儿盖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通过的决议,再次重申:“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16]”除了积极培育民族干部外,“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始终重视统一战

线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的积极开展有力地促进了红军长征的胜利。^[17]在长征时期，统战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上层进步人士，虽然他们同劳动人民之间存在阶级矛盾，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反帝反国民党军阀的爱国立场，在群众中具有很大的威信，他们是“党在革命斗争中争取同盟力量，取得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战略和策略，也是党结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创立的政策。”^[18]

发展民族文化教育的研究。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主张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这对加强民族团结，改善民族关系，增进各民族的联系和交往，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发展，有积极作用。在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1935年6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明确指出：“提高康藏民众的文化，运用康藏自己的语言文字设立学校。”^[16]西北军区政治部在《少数民族工作须知》中也提出：“要帮助少数民族的文化工作，建立本民族的学校，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教授。”^[16]中国共产党大力宣传各民族都享有教育权利，积极建立以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并要求红军战士学会用少数民族语言与民族地区群众做简单交流，在平时的宣传中也使用汉文和少数民族语言两种文字，充分体现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

2.2 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区域实践研究

红军长征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途径多少少数民族聚居地，为确保长征的顺利进行，中国共产党根据具体的情况，对不同地区所实行的民族政策也有所调整。有学者指出，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红军战士严格按照中央指示，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并根据当地的习俗，红军指挥员刘伯承与彝族沽基支头人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这是民族政策正确运用的光辉典范。”^[19]此外，红军长征途经四川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党中央严格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开创了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崭新局面。”^[20]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根据长征的实际情况灵活制定民族政策，1934年11月底，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向西进入广西老山界瑶族聚居地区时，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关于瑶民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和口号》，指出民族平等原则的贯彻与执行，应依据不同的环境和情况‘加以具体与通俗化’，对他们传统的思想习惯甚至统治方式等‘应表示尊重’。”随后，红军在转战湖南和贵州的苗、侗、布依族地区期间，中国共产党又发布了《沿途注意与少数民族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杜绝一切不利于搞好与民族群众关系的行为。”^[21]分布在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回族是红军长征经过的一个重要区域之一，在红军长征之前，生活在这两地的回族人民长期遭受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压与剥削。有学者指出，红军长征途径聚居在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回族时，

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回族的社会现状，“制定了以民族平等为原则的对回族政策，”并“尊重回族风俗习惯，并发展回族教育，帮助其建立自治政权，培养人才，使回族走上了民族解放的新生之路。”^[22]

2.3 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意义研究

研究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不仅要对其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解读，揭示出其深远的历史影响或者说当代价值。学者们一致认为，正确的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确保了长征的胜利进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对于红军长征途中战略计划的实现和战斗任务的完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3]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为此后进一步制定民族政策积累了经验，并“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24]有学者强调，长征使党中央频繁与少数民族接触，“在这一接触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已制定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工作中加以检验和修正，完善和发展了这些政策，使党的民族政策趋于成熟。”^[25]

同时，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践行与宣传，在客观上“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觉醒。”^[26]也有学者认为：“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制定和贯彻执行，为团结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及广大群众，确保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实现战略大转移以及推动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7]还有学者指出，长征时期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在现实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党和政府对民族政策都有了进一步的充实和提高，保证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但在现实中，一些有损于少数民族群众感情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认真总结和研究长征中的民族政策及其实践，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当今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现行民族政策，努力做好新时期的民族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和深远意义。”^[28]

3 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通过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研究成果的简要回顾与梳理，不难看出，在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学者们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对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共识，也涌现出了一些颇具特色的见解。然而我们在分享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要看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3.1 研究内容重复性比率较高

从研究文献的具体内容来看，重复性比率较高，尽管有些选题不同，研究的视角也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人云亦云的见解比较多，而提出创新性的观点较少，研究的内容仍停留在民族政策研究的旧有范畴和视野中。例如，关于长征时期民族政策具体内容研究这一方面，多数的研究仍停留在民族政策原有的字面内容上，缺乏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另外，

新史料的引用较少,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挖掘和抢救新的文献资料。而从思路与见解上来看,不少论文创新性不足,或照搬前人的研究思路和观点,只在史料和论述上稍作调整;或只在新的理论框架内填入旧材料,简单综合他人的观点连缀成篇,这些在其他研究领域中常见的弊端在本问题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

3.2 研究方法相对单一

整理关于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研究文献后不难发现,多数的研究者采用的是文献法,即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族政策展开具体的论述。虽然这种研究方法可以最大限度的还原历史,但单一的使用文献法使论文容易变成史料的简单堆砌,缺乏对解决现实问题指导意义的延伸阐释,说服力也不强。比较研究法是除文献法之外,学者们在研究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时常用到的一个普遍方法,如运用比较研究法研究中国共产党对不同民族实行不同的民族政策,使论文具有一定的新颖性。此外,历史分析法等其他一些方法虽然也在一些文章中被用到,但相对而言,研究方法的欠多样化仍然是本问题研究中的一大不足。

3.3 研究视角相对较窄

研究视角决定了文献材料的选用和研究方法的运用,也体现出论题的解读侧重点。目前,关于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研究,主要是从整体性视角来把握的。一方面,学者们善于将长征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历史整体中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其与其他历史时期民族政策的差异,揭示其阶段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学者们习惯于将民族政策的实施对象或者是实施区域等视为一个历史整体,研究其包括长征时期在内的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特性,以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各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如对藏族、彝族、回族的民族政策与措施的历史发展研究等。从这两方面视角展开的研究成果基本都达到了其研究目的,但也由于这种研究视角范围的限制,使得已有文献资料很难推动现有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也很难开拓新的研究视野,构建新的研究框架,容易导致文献解读过程中一致化程度较高,总结、反思、批判性内容较少的现象,与相关领域的学术前沿还存在一定差距。

4 研究展望

四十年来,有关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研究总体而言瑕不掩瑜。在以后的研究中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4.1 研究内容应紧跟时代步伐

学术研究不仅需要理论进行丰富和扩充,更需要一种现实关怀,阐扬理论的当代价值及其对现实问题的指导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研究中,紧跟时代的步伐,紧密围绕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与部署,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我国是

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稳定和融洽,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中国共产党一直都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反映到具体的民族工作上,就是要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民族事务的治理能力和效果。

因此,如果仍然停留在就历史谈历史,就文献谈文献,其现实价值就无法彰显。在“疆独”“藏独”等境内外敌对分裂势力严重危害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背景下,民族工作日趋复杂和艰巨,从民族事务治理的视野去回顾、总结、探索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及其实践过程,积极阐扬其当代价值与意义,以提升当前民族事务的治理能力,团结各族人民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应当是学术界施力的重要方向。

4.2 研究方法应多借鉴其他学科成果

迄今为止,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研究,多数仍局限于历史文献学的领域之中,主要采用的也是历史文献分析方法,整体上尚未跳出前人研究的视野和范畴。要打破这种局面,就必须借鉴其他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如把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特别是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到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研究中,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进一步提高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研究的科学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甄别其研究范式是否适合此领域,以做到多学科方法的真正融合。此外,还可以多召开学术研讨会和进行访学等等,通过学术交流和思想的碰撞,拓宽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4.3 研究视角应细化和拓宽

把握中国共产党在长征初期、中期及后期民族政策的变化和发展历史时,应将研究的视角具体化,以拓宽研究领域。一是从研究区域进行细化和拓宽。红军长征经过14个省份,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目前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实施的区域研究主要集中在贵州、四川、宁夏、甘肃等地,而对湖南、江西、福建等几个省的相关研究文献则十分缺乏。这就需要研究者们多关注这些尚属薄弱的环节,将研究的视角适当倾斜。二是从研究对象进行细化和拓宽。长征时期民族政策的实施对象为各少数民族,而当前有关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为藏族、回族及彝族等几个少数民族上,而对其他少数民族研究总体上较少。红军长征的胜利离不开所经过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的帮助,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团结和争取各少数民族的支持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是对这些少数民族在长征期间所做贡献的认可和尊重,也是对历史的正视,这也将是今后学界努力的方向。而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时期发布的一系列公告布告等文件,如《关于苗族民族中工作

原则的指示》《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及《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等,也提供了可供挖掘的丰富史料。三是目前研究多集中于探讨红一方面军在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及其实践,而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相关论述则很少,更是鲜有涉及这四支队伍在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及其实践的比较研究,对于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民族思想也还有待进行深入挖掘和比较研究。这些都值得和需要学者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花更多精力去丰富和深化。

参考文献

- [1] 朱晓舟,何芳芳.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践与经验[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3).
- [2]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M].北京:中国共产党党史出版社,1999.
- [3] 闵绪国.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及其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J].北京党史,2006(6).
- [4] 阎丽娟.党的民族政策与红军长征的胜利[J].兰州大学学报,1996(4).
- [5] 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6] 崔广陵.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与红军长征的胜利[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1).
- [7] 支绍曾.红军长征与党的民族政策[J].军事历史研究,1996(4).
- [8] 张海香.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期间的宗教政策[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6).
- [9]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M].北京:中国共产党党史出版社,1999.
- [10] 李德明.红军西征[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 [11] 张嘉选,张金凤.关于红军长征期间党的民族政策问题[J].青海社会科学,1996(S1).
- [12] 张文琳.论红军长征在甘、宁期间对回族实行的政策[J].民族研究,1996(6).
- [13] 四川省冕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冕宁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 [14]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M].北京:中国共产党党史出版社,1999.
- [15] 王洪,赵庆鸣.红军长征过云南时党的民族政策及影响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
- [16] 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7] 白冰.论红军长征中的统战工作[J].兰州大学学报,1996(4).
- [18] 郎维伟,王永正,肖旭.红军长征过羌区与党的民族政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0).
- [19] 冯祖贻.“彝海结盟”与长征中我党的民族政策[J].贵州民族研究,1991(2).
- [20] 李全中.红军长征对四川少数民族的历史性影响[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5).
- [21] 莫曲波,颜永强.论长征时期党的民族风俗政策[J].广西社会科学,2013(4).
- [22] 李荣珍.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的政策[J].回族研究,1996(4).
- [23] 田荣发.浅谈红军长征期间的民族政策[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2).
- [24] 张巨成.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实践及启示[J].学术探索,2017(9).
- [25] 熊坤新,严庆.红军长征的胜利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J].中国民族,2006(11).
- [26] 张焱,阎占定.唤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宣传的历史功能[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7).
- [27] 黄升任.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及其现实借鉴意义[J].广西民族研究,1997(1).
- [28] 杨盛规.红军长征与党的民族政策[J].中共党史研究,1996(5).